

唐洛阳宫集贤院址及布局考*

王书林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Abstract: Jixian Scholar Office in Ta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 for collecting books in the palace, which had functions such as compiling books, waiting for imperial orders and advising on etiquette system, etc. Its location was of great value to the study of palace layout and political spa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the boundaries of Jixian Scholar Office are studied as follows: east to Mingfu Gate Street in Tang Dynasty, north to Zhangshan Gate Long lane, west to Mingfu Gate West Street, south to today's Tang Gong Zhong Road. Furthermore, the internal layout of Jixian Scholar Office was re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an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foundation sites of two buildings in No.2 excavation area in the middle of West Area in Luoyang Palace in Tang dynasty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north corridor of the west courtyard and the main hall of the middle courtyard of Jixian Scholar Office.

Keywords: Luoyang Palace in Tang dynasty, Jixian Scholar office, Layout

摘要: 本文综合分析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 确定了唐洛阳宫集贤院的四至范围为东至唐明福门外大街(T837与T74之间), 北至章善门横街(GT56-77), 西至明福门外西街(T57及以西), 南至GT56-77向南对应的今唐宫中路一带(约T674南扩探方向东的延长线上)。进而根据文献复原集贤院内布局, 指出大内西区中部二号发掘区中所见两处唐代建筑基址可能与集贤院的西院北行廊和中院正堂有关。

关键词: 唐洛阳宫; 集贤院; 布局

唐代在太极宫、大明宫、洛阳宫中设置的集贤院, 是重要的内府藏书和修书机构, 具有重要的文化职能。此前学者对集贤院的历史沿革、定位及职能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集贤院隶中书省, 除图书整理、保存外, 还兼具编撰

著述、侍读待诏、参议礼仪制度等职能, 其所处位置对于宫城布局和政治空间的研究具有较高价值。目前关于集贤院址的研究一般从文献记载出发^[2], 确定集贤院的相对方位和范围, 但对其与周边宫院和曹署的关系却难有比较准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建筑史学视野下的建筑遗址研究——以洛阳出土隋至宋时期的宫殿建筑遗址为例”(批准号: 52008004)的阶段研究成果。

确的把握。

隋唐洛阳城经60余年的考古发掘,洛阳宫城核心区特别是前朝区域已积累了大量系统而完备的资料,大内功能分区较为清晰,为研究洛阳宫集贤院选址及其与周边功能区的空间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本文拟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讨论洛阳宫集贤院的位置及布局。

一 洛阳宫集贤院的创建历史

关于洛阳宫集贤院的创建情况,比较可靠者为《唐六典》和《集贤注记》的记载。这两部书的编撰皆与集贤院的创立有关^[3],成书年代也与集贤院设立的时间相近,故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结合相关文献可知,洛阳宫集贤院的创建过程如下。

1. 乾元殿写书廊时期:开元五年至六年冬

开元五年,“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4]。开元六年,“制令中书门下及文武百官入乾元殿,就东廊观书”^[5]。开元六年冬,“及还京师(长安),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6]。

2. 丽正书院时期:开元十年三月至开元十三年四月

开元十年三月,“车驾幸东都,始移书院于明福门外中书省之北,仍以丽正为名”^[7],“院内屋并太平公主所造”^[8]。开元十一年,“归京师(长安),始于大明宫光顺门外创造书院,依旧谓之丽正书院”^[9]。开元十二年冬,“车驾入都,始于明福门外别置院,亦以丽正书院为号”^[10]。

3. 集贤院时期:开元十三年四月以后

开元十三年四月^[11],“诏改集仙殿为集贤殿,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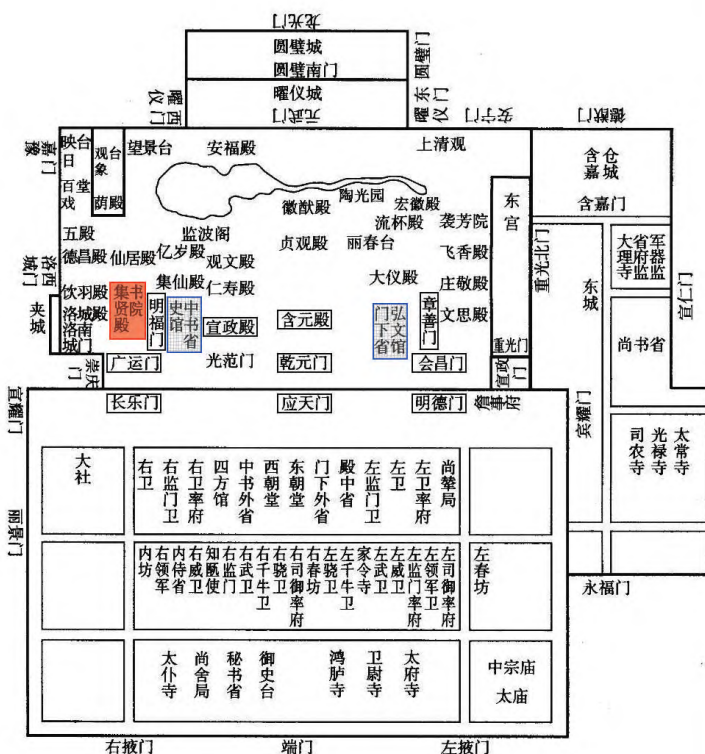
二 集贤院与明福门外曹署

集贤院位于洛阳宫明福门外,是洛阳大内西路诸曹署汇集之地。隋炀帝建东都

洛阳宫,在西路自景运门至显福门,东路会昌门至章善门之间布置曹署区^[13]。唐代这一区域仍为曹署之用,东有门下省、宏文馆;西有中书省、省西史馆、省北命妇院、院北修书院、史馆南内医局、北尚食厨^[14]。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沿用了这一记载^[15]。

至于集贤院的具体位置,徐松在《东都宫城皇城图》中将集贤殿、书院绘于明福门以西,将史馆、中书省绘于明福门以东,以广运门至明福门一线为分隔,曹署分列左右,或是对《大业杂记》中“道左”“道右”皆分布曹署的解释。(图一)对此,学界有不同意见。傅熹年先生所绘《唐洛阳宫平面复原示意图》,以广运门—明福门一线将宫城西部分为两个区域,东为武成宫和中书省,西为集贤殿、尚食厨、命妇院、史馆和内医局。(图二)贾鸿源先生认为,徐松所绘图纸不合理,但关于诸曹署间相对方位的记载是可靠的,并重绘图纸。(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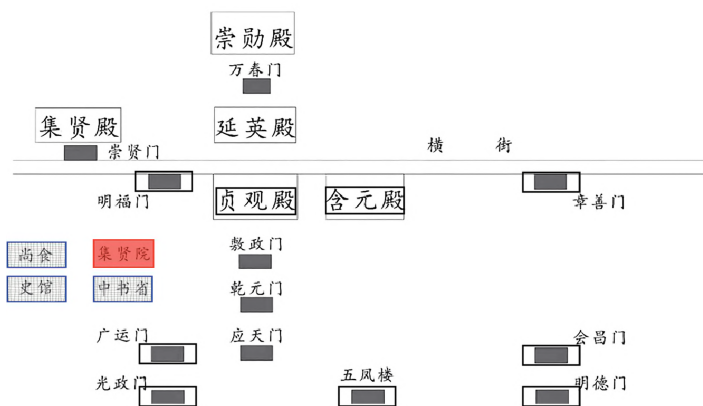
上述研究将曹署分为东西两列,且集贤院皆位于明福门以西,与文献记载相符。但对于诸曹



图一 徐松《东都宫城皇城图》中集贤殿位置(原图引自徐松《唐两京城坊考》)



图二 傅熹年《唐洛阳宫城平面复原示意图》中集贤院位置（原图引自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卷2，图3-2-5）



图三 贾鸿源《唐哀帝天祐二年洛阳宫城布局示意图》中集贤院位置^[16]（原图引自贾鸿源《敦煌本〈刺史书仪〉“俵钱去处”所涉后唐宫城诸门位置商榷》）

署之间、曹署与街道间空间关系的看法却并不统一。洛阳宫经过长时间的考古发掘，在大内西区发现了多处唐宋时期的宫殿建筑基址。将考古发掘材料与历史文献结合，互证互补，丰富格局和空间信息，可对集贤院的位置及诸曹署的布局有更深入的认识。

三 空间参考系的确定

据《河南志》所载可知，集贤院在中书省、

命妇院以北，史馆、尚食局以东，是位于洛阳宫西内曹署区东北角的一组建筑。“东京集贤院在明福门外大街之西。院东隔街对武成宫。院西又有南北街，街西则史馆及尚食局。南邻中书省，北接宫城。院内东西四十一步，南北五十八步……书院大门之外有水渠一道，北从崇贤门南流至此”^[17]，“明福之西曰崇贤门，其内曰集贤殿”^[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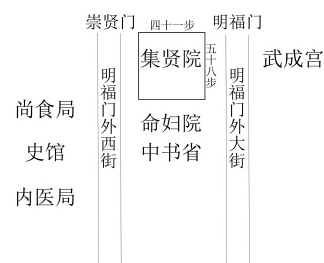
综合以上文献描述可知，第一，明福门外大街以东是武成宫院，以西则是曹署区。那么唐代诸曹署的分布范围为东至明福门外大街，北至明福门—崇贤门一线，南至广运门。其西界并无明确的文献资料。第二，明福门外大街是南北向街道，其西侧还有一条南北街，为便于叙述，本文称这一南北街为“明福门外西街”。明福门外西街将曹署分为东西两列，东为集贤院、命妇院^[19]、中书省，西为史馆、尚食局、内医局等。第三，集贤院门外有水渠一道，自崇贤门南流，似为明渠，则明福门外西街旁可能有南北向水渠。那么，集贤院的分布范围为东至明福门外大街，北至明福门—崇贤门一线，南临命妇院、中书省，院内东西四十一步，南北五十八步的范围。（图四）

从遗址出发讨论集贤院实际四至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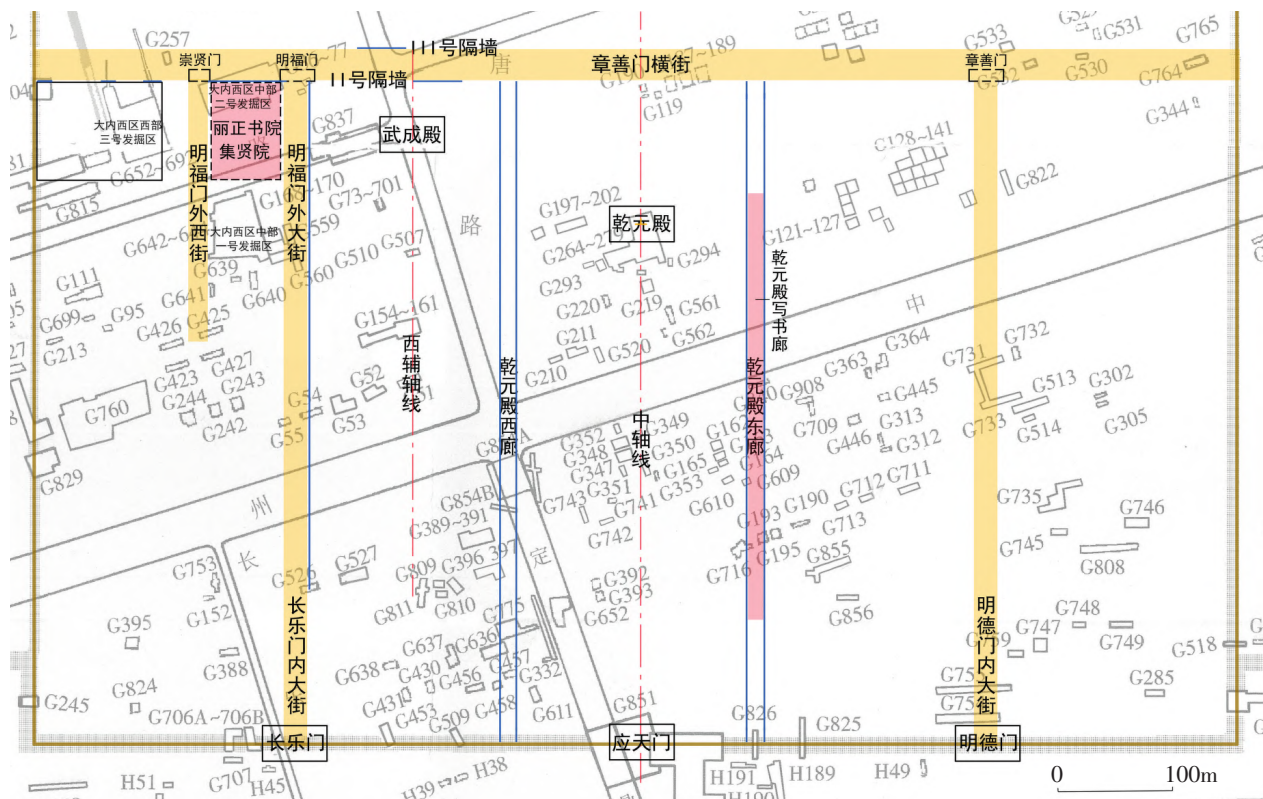
1. 北界：明福门—崇贤门一线

章善门和明福门（即隋显福门）是唐洛阳宫“入内”的关键守卫节点^[20]，而连接二者的章善门横街，则是外朝与内朝的分界^[21]。因此，明福门和崇贤门当位于章善门横街的西段。

笔者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认为唐宫东路西端略偏东的现代道路



图四 集贤院相对位置示意图



图五 重要参考点分布图

南沿发现的盛唐路土痕迹，与定鼎北路以西的二号路土（GT687）^[22]和三号路土（GT56-77）^[23]，以及唐宫东路与定鼎北路交叉口东南角（TG3）的II号隔墙以北的路土连为一线，应该是章善门横街遗痕^[24]。（图五）

章善门横街宽约34米，南北均设隔墙，南面为II号隔墙，北面为III号隔墙^[25]。明福门、崇贤门等门址就开设在横街西段上，其位置应沿着II号隔墙向西寻找。在大内西区中部二号发掘区GT56-77发现唐代东西向隔墙，与II号隔墙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唐代墙体宽度约1.55~2.16米。这两段墙体皆发现补筑痕迹，曾多次加宽，内外墙面都抹白灰墙皮，II号隔墙还发现表面涂红色的痕迹，这应该是章善门横街隔墙的表面刷饰。GT56-77中隔墙两侧均发现础坑，说明隔墙南北皆设有廊道。隔墙西段南部发现东西20.5米，南北约3米的局部南廊（二号基址），后在该南廊南沿扩建出三号基址。

再往西，为大内西区西部三号发掘区，发掘者认为这是一处唐代宫院遗址。此处宫院遗址的北步廊恰位于上述隔墙向西的延长线上，与大内

西墙相交^[26]。在北步廊基址基础夯土南侧上部，清理出一段残高约5厘米的白灰墙皮，说明北步廊上建有隔墙；白灰墙皮外涂红色，与上述II号隔墙表面装饰一致；隔墙位于北步廊中部，可知隔墙南北皆设廊道，步廊总宽6.8米，减去隔墙宽度2米，则南北廊道各宽2.4米，与GT56-77中发现的局部南廊宽度接近。从北步廊的位置和形制分析，认为其也为章善门横街南墙西段的一部分。

这道隔墙贯穿洛阳宫大内东西，以北为章善门横街，以南并不设置通长的廊道，而是与各宫院、曹署建筑群相结合，根据需要设置单边廊道或双边廊道，甚至依靠隔墙建设单体建筑^[27]。这或许是在长期使用、改建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从遗迹现象看，隔墙以南的建筑是断续存在的，不构成统一整体。这样的空间组织方式与洛阳宫大内常见的长廊有所不同，如大内中轴线两侧的东廊^[28]、陶光园南廊^[29]等是宫院或功能分区的边界，需要独立贯通的长廊。而东西向的章善门横街和隔墙贯穿大内东西，本身已实现了南北分区的功能，隔墙以南的空间分属多座宫院，故隔墙自然也就成为各宫院的组成部分而为其所用。

章善门横街向西抵达宫城西墙，其西段是明福门外诸曹署的北界。

2. 东界：明福门外大街

集贤院位于明福门外大街之西，院东隔街对武成宫院，说明明福门外大街位于武成宫院以西。武成宫院西边界位于G837西部，与G53连为一线^[30]。那么，武成宫院西界（GT837）与GT56-77探方之间，有东西约20米的空间，明福门外大街是否就在这里呢？文献中还有两条线索可以参考。

《大业杂记》“閤西二十步，又南行六十步，有西华门。出门西三十步，道北有武安门，门内有武安殿，周以轩廊。西华门南四十步，有右延福门。出门西行一百步，至显福门街”^[31]。可知，从乾元宫院西华门出，向西可进入武成宫院，从右延福门出，向西可至显福门街（即明福门外大街）。西华门和右延福门为乾元殿西廊上的东西向横门。因此，自乾元殿西廊西行百步（147米）可达明福门外大街。考古已发现乾元殿西廊（T922和T854A、B）^[32]，从这里向西147米，恰位于武成院西界附近，与前面推测的明福门外大街的位置较为接近。

《河南志》载，“长乐门内曰广运门。次曰明福门”，说明明福门与长乐门、广运门可能有南北对位关系。经考古勘探和发掘，已发现长乐门位于西工区长乐街小学院内^[33]。门址应为三门道结构，门道北侧发现路土，宽约15米，不过，长乐门内再往北就没有路土依据了。但在宫城东侧，与长乐门对称的明德门以北发现了多处路土痕迹，且可连为一线。这条路土最远抵于第一汽车运输院内的2号发掘点^[34]，也就是说，明德门内大街至少向北延伸了300米，合200步，可知明德门、会昌门、章善门三道门为南北对位关系。考虑到隋洛阳宫始建时具有统一的规划设计，东西对称明显，那么长乐门与其以北的广运门和明福门也应是南北对位的关系。从长乐门遗址出发向北延伸，与章善门横街南隔墙相交处，就应是明福门的位置。这一位置正位于GT837与GT56-77探方之间^[35]。

根据与长乐门对称位置的明德门钻探情况，可知明德门址总宽20~22.5米^[36]，门内路土宽约18米^[37]，长乐门门道内路土宽约15米，故推测明福门外大街的宽度应该在15~20米之间，也可容纳于上述区域。

综上，明福门外大街应向南与长乐门相对，位于T837与T74之间，是明福门外诸曹署的东界。

3. 西界：明福门外西街

根据文献梳理，可知明福门外西街有如下特点。

- (1) 南北街，位于明福门外大街之西；
- (2) 街北抵章善门横街的南隔墙，对崇贤门；
- (3) 街西是史馆及尚食局，街东是集贤院；
- (4) 街旁有水渠一道，自崇贤门向南流。

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沿章善门横街南墙，从明福门外大街向西，第一处门址为T62唐代隔墙上的门址^[38]。（图六）在这处门址以南的G641探方中发现南北向路土，路土上还有车辙的痕迹^[39]。在明福门外西街与明福门外大街之间，紧邻章善门横街之处即为集贤院。“院内东西四十一步，南北五十八步。”^[40]若T62至G641一线为明福门外西街，那么从明福门外西街东界（T62门址东界）至明福门外大街西界（约位于T74东南角）之间，只有50米合34步，与文献所载集贤院东西41步尚有约10米的差距。

按文献所记，崇贤门旁应有水渠沿着集贤院西墙向南流。门址遗迹（T62）附近并未发现唐代水渠，也未发现集贤院西墙。相反，这一门址向南并不直接连接南北向道路，而是进入唐代二号建筑基址和三号建筑基址内部。该门道宽2.6米，远小于其他宫城门道宽度。此外，门道仅出现于晚期墙垣上，在早期墙垣上并未得见，可知这一门道是改修的结果，而非始建时的形制。综上所述可知，T62发现的门址应该是院落或建筑内部门道，而非宫城崇贤门门址所在。

那么，集贤院的西界应从门址遗迹再向西扩展，至少抵唐代墙垣最东侧的柱洞（约7米），至多至北宋基址的西边界^[41]（10米），再往西就是

扰沟。唐代明福门外西街和水渠的位置或许就在扰沟附近(T57及以西)。

4. 南界：命妇院、中书省

关于集贤院南界，尚无考古资料支撑，但若以南北五十八步为线索，则大致位于大内西区中部一号发掘区以北的唐宫中路上。在这条线以西，跨明福门外西街，隔街相对，即前述大内西区西部三号发掘区。

发掘所见宫院平面呈方形，边长约80米，四面步廊围合。在宫院西北角发现八角形角亭，西南角发现方形角亭，发掘者推测宫院东北和东南角也应设角亭，与西部角亭对称^[42]。

这组宫院与集贤院之间有约40米的東西距离，除去明福门外西街和水渠的宽度，似还可容纳一组狭长的院落。不过从“史馆南内医局，北尚食厨”，可知史馆和尚食局是南北关系，而非东西关系。考虑到史馆是明福门外诸曹署中的重要建制，当不会委屈于南北狭长的小院中。因此，大内西区西部三号发掘区发现的宫院遗址很可能就是明福门外西街以西的一路建筑群，包括史馆、内医局、尚食厨等。这也从侧面说明明福门外诸曹署的西界为大内西墙。

将考古遗址与文献对应，明福门外西街以西的这一路建筑群，最北者为尚食局，中为史馆，南为内医局。上述宫院遗址紧邻章善门横街南墙，是最靠北的一组建筑群，当为尚食局区域^[43]。不过，考古工作只发现了四周步廊的边界和西北、西南两处角亭，标示出一定的围合空间，但不能确认这就是一处完整的宫院遗址，也不能确认这就是尚食局的范围。这是由于以下原因。

1. 该宫院东步廊以东，与集贤院之间，还有东西约40米的空间，除去街道和水渠的宽度，其余部分可能还存在院落。

2. 一般而言，同一座宫院会用相同式样的角楼，但该宫院西北和西南角楼形制不一致。西北八角形角楼向南与西步廊连为一体，角楼东部发现散水，说明角楼与北步廊并未相连。无独有偶，西南角方形角楼向北也与西步廊连为一体，而在东侧出现南北向基础夯土，且有南北向包

砖，也说明西南角楼与南步廊并未相连。两处角楼皆位于大内西墙上，故推测西步廊和角楼可能与大内西墙的设置有关，即贴着大内西墙建设步廊，而非宫院围廊。

3. 宫院四面步廊结构和宽度不同。从发掘情况看，西步廊三条夯，宽11米，北步廊1条夯，宽6.8米，东步廊2条夯，宽7.1米^[44]，南步廊最宽，约12米^[45]，也说明四面步廊不是统一设计和建设的。因此，这几处步廊遗迹将明福门外西街以西划分为更小的空间单元，但不一定构成独立宫院，可能与尚食局有关^[46]，更多的研究尚有赖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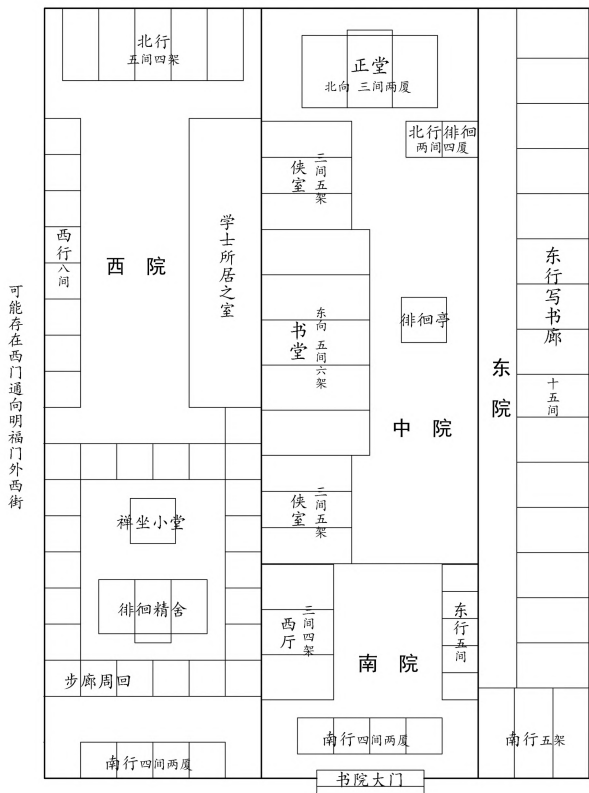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这组建筑群南北步廊相距约80米，与其东侧集贤院南北58步(85米)，尺度非常接近。那么集贤院与这组建筑群以南，很可能共用一条东西向道路。再往南是其他曹署区域。即各曹署以明福门外西街为界，分列东西，但彼此间存在一定对位关系。

四 东都集贤院的布局

韦述《集贤注记》对东都集贤院的布局有着详细的描述。

东京集贤院在明福门外大街之西。院东隔街对武成宫。院西又有南北街，街西则史馆及尚食局。南邻中书省，北接宫城。院内东西四十一步，南北五十八步。书堂东向，五间六架。东院东行写书廊十五间，南行五架。书堂之南，侠室三间五架。书堂之北，侠室三间五架。北行徘徊两间四厦。院庭当中徘徊亭一间，四厦。南院西厅，三间四架，东行五间，南行四间两厦，当书院大门。永巷南正堂，北向，三间两厦。西院南行四间两厦，北行五间四架，西行八间。院庭当中有徘徊精舍，四面步廊周回，南向开门，兼有禅坐小堂一间。精舍院内又轩廊，接学士所居之室。书院大门之外有水渠一道，北从崇贤门南流至此^[47]。

文中详细记录了集贤院内建筑分布情况，按东院、南院、西院的顺序分别描述，为了解集贤院平面格局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为复原集贤院平



图六 集贤院格局文献复原示意图

面布局，本文首先对书堂、徘徊亭、徘徊精舍等重要建筑的位置进行辨析和讨论。

五间六架的东向书堂，并南北各三间五架的挟室，于东院建筑群前后叙述，从行文顺序看似属于东院。若如此，则第一处“院庭”当指东院院庭，那么徘徊亭则也位于东院。但颇为特别的是，书堂和南北挟室皆东向，且在建筑上应连为一体，在文中却并未接续叙述，而是拆分两句，先叙书堂，再讲东院，接着记书堂南北的挟室，出现了语句穿插的现象，说明其叙述顺序可能不那么简单，故需明晰书堂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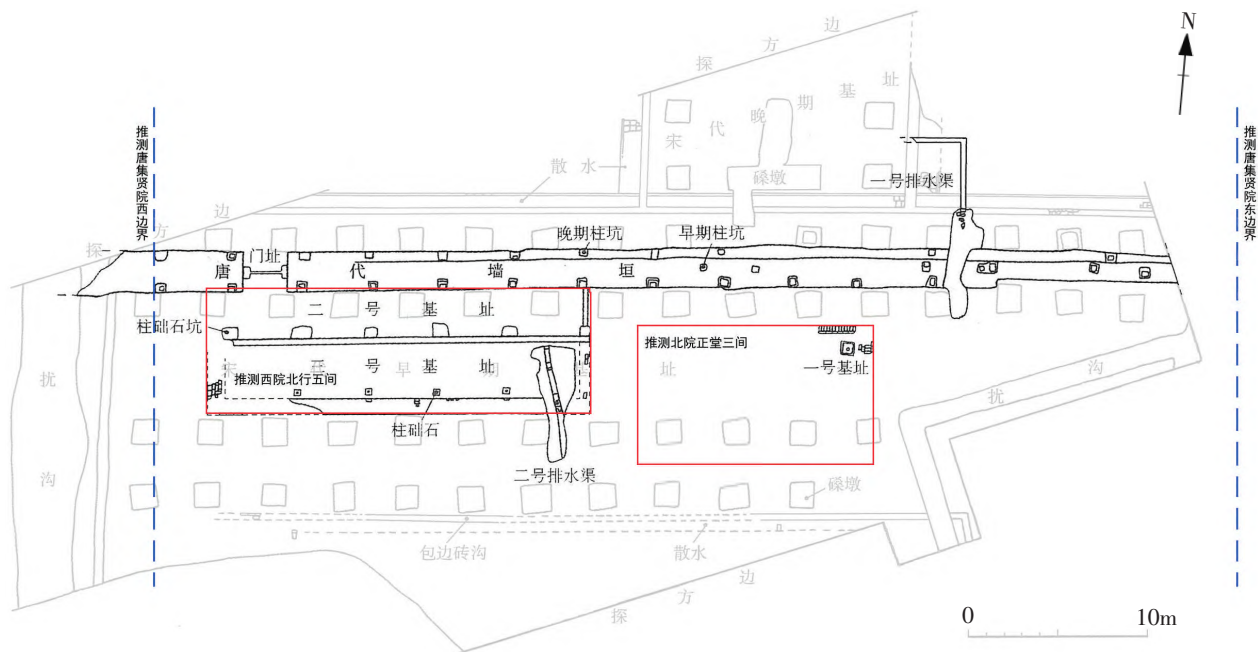
从西院“北行五间四架”^[48]、南院“南行四间两厦”“正堂北向三间两厦”可知，西院和中院东西至少有面阔五间的宽度。按行廊平均面阔4米/间测算，则西院和中院占地至少东西宽40米。集贤院内东西41步，合60米。那么东院至多宽20米。“东院东行写书廊十五间”，南北长约60米。书堂和挟室南北共长11间，约49米。而集贤院南北58步，合85米，则东院写书廊与书堂无法错位布置于同一院落，只能并列布置不同

院落。也就是说，若书堂位于东院内，则将与写书廊共用20米进深。书堂进深“六架”，约12米，即使压缩写书廊进深空间至两架，即4米，二者之间只存条形过道，根本无法再容纳院庭中的徘徊亭。

因此，书堂不可能位于东院建筑群中，而应位于中院建筑群中。结合其后南院的描述，可推测书堂、挟室、北行徘徊廊、徘徊亭等几座建筑应共处一院，位于南院之北。此处仍以建筑尺度数据核验之。书堂和挟室南北49米，东西12米，北行徘徊两间东西8米，南北4米，徘徊亭5米见方，加上建筑周围过道空间，则书堂建筑群东西至少22米，南北50米。南院西厅南北三间15米，东西8米，东行廊南北五间也15米，东西4米，南行廊东西四间16米，南北4米，则南院建筑群东西16米以上，南北20米。这一区域与书堂建筑群可南北相对，南北总长度约70米，小于集贤院南北85米的尺度。书堂建筑群以北，还有一座两厦的北向正堂，东西面阔三间15米，进深或是四架，合8米。

再看西院。“南行四间两厦”，东西面阔16米，南北进深4米。“北行五间四架”，东西面阔20米，南北进深8米。“西行八间”，南北面阔32米，东西进深4米。那么西院建筑群东西至少20米。院庭中有徘徊精舍，若与八间西行廊相对，则步廊周回的精舍院仅有东西不足15米的空间安放，过于局促也不利于交通。因此徘徊精舍更可能与西行廊错位布置。考虑到“精舍院内又轩廊接学士所居之室”，居室一般位于院落中后部，那么徘徊精舍则可能位于西院南部，而“学士所居之室”“则可能位于西院北部”。

综上，我们可基本复原集贤院的院落格局。整体分为中院、东院和西院，其中中院是最重要的院落，以东向书堂为中心，南部是书院大门，北部是北向正堂。东院以写书廊为中心，西院以徘徊精舍为中心。西院向西当有门通向明福门外西街。从单体建筑尺度的情况分析，东院应该最窄，东西约12米，中院和西院可能东西各24米。（图六）由此可知韦述的记录顺序是，先讲



图七 集贤院北部遗迹图

中院核心建筑书堂，再讲东院配套写书廊，这是两组跟集贤院功能直接相关的建筑。接着重回中院描述书堂建筑群、南院建筑群和北堂，最后写到西院。

集贤院位于T56-T75中唐代隔墙（即章善门横街）以南的区域。在紧靠隔墙区域发现的一些建筑遗迹，似与上述集贤院建筑存在关联。

位于西侧的2号基址和3号基址的柱网南北对位，为面阔五间的建筑。其中2号基址南沿外侧有包边砖沟，说明其原为独立建筑。3号基址是在2号基址的基础上加建的。从空间位置看，两基址位于集贤院的西侧，为西院所处范围。若其为集贤院内建筑，则可能是文献中的西院“北行五间四架”。以四架为进深标准衡量，则西院北行廊应包含2号和3号基址。

1号基址位于2、3号基址东侧。其东北角距2号遗址东边界仅4间行廊宽度，因此该建筑遗址最多东西面阔三间，规模很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座面阔三间的建筑，距北墙3米，其东、北方向两面皆砌有包边砖和散水，较为考究。从建筑材料尺度看，1号基址所用柱础边长0.6米，比3号基址所用柱础边长0.35~0.4米大，也说明其等级较3号基址高。将其纳入集贤院平面考量，可知其应位于中院北部。那么，该建筑则可

能为文献中朝北的面阔三间的“正堂”。若T56-T75所见建筑遗址确与盛唐时期的集贤院有关，那么集贤院的西界当在唐代墙垣西侧第一列柱网的位置为宜。（图七）

综上，唐代洛阳宫西内以明福门外大街作为宫城功能分区的界限，其东侧为乾元宫院和武成宫院，乃外朝和正衙，西侧为曹署区。曹署区紧邻外朝核心区域，便于政务的通达、朝仪的开展。但又相对独立，与三殿和内朝功能区之间分别以明福门外大街和章善门横街分隔，营造出规整而自成体系的空间单元。曹署区内又以明福门外西街作为分界，东西分列曹署，还可能设计有东西向横街，划分各曹署空间，建立东西曹署之间的联系。

本文基本确定了集贤院的空间位置。其位于明福门外大街以西，章善门横街以南，东对武成宫，北向集贤殿，南邻中书省，西近史馆，位置显赫，地位突出。因已发掘的建筑遗址面积有限，难以据此做出完整而准确的复原平面。但就现有遗址局部分析，与文献有所呼应，可能与盛唐时期的集贤院存在关联，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待考古工作的更多发现。

[1] 郑伟章. 唐集贤院考 [C] // 文史 (第十九辑) 北京: 中

- 华书局, 1983 (19): 65-85; 赵永东. 唐代集贤殿书院考论 [J]. 南开学报, 1986 (4); 刘健明. 论唐玄宗时期的集贤院 [C] // 隋唐史论集. 香港: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93: 54-64; 李湜. 盛唐时期的集贤院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5 (3); 李芳瑶. 韦述与盛唐的集贤院——以《集贤注记》为中心 [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13 (3); 杜海斌. 唐代集贤院新探 [C] // 唐史论丛 (第23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6: 131-142.
- [2] 杨鸿年. 隋唐宫廷建筑考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544-547; 贾鸿源. 《唐两京城坊考》洛阳官城内诸曹署方位考误 [J]. 中国史研究, 2019 (4).
- [3] 张弓. 《唐六典》的编撰刊行和其他 [J]. 史学月刊, 1983 (3); 李芳瑶. 韦述与盛唐的集贤院——以《集贤注记》为中心 [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13 (3).
- [4] “集贤殿书院, 开元十三年所置。……洎开元五年, 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 以充内库, 仍令右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总其事……六年, 驾幸东京; 七年, 于丽正殿安置, 为修书使。……十二年, 驾幸东都, 于命妇院安置。十三年, 召学士张说等宴于集仙殿, 于是改名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李林甫. 唐六典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279.
- [5] [7] [9] [10] [12] 韦述. 集贤注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207-218.
- [6] “会幸东都, 乃就乾元殿东序检校。……及还京师, 迁书东官丽正殿, 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其后大明官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 皆创集贤书院, 学士通籍出入”。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936; 韦述. 集贤注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207-218.
- [8] “(集贤院) 东都在明福门外大街之西, 本太平公主宅, 十年三月, 始移书院于此, 西向开门。院内屋并太平公主所造”。王溥. 唐会要 (卷64)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1118.
- [11] “(开元十三年) 夏, 四月, 丙辰, 上 (玄宗) 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上曰: ‘仙者凭虚之论, 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 朕今与卿曹合宴, 宜更名曰集贤殿。’” 司马光. 资治通鉴 (卷212)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6764.
- [13] [31] 杜宝撰, 辛德勇辑校. 大业杂记辑校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8.
- [14] “(唐) 明德门内会昌门, 隋名, 次曰章善门, 门内有门下省、宏文馆。长乐门内曰广运门。隋名。其后留守府, 在广运门内。次曰明福门。本名显福, 避中宗名改。内有中书省。省西史馆, 省北命妇院。院北修书院, 本太平公主内宅。史馆南内医局, 北尚食厨”。徐松辑, 高敏点校. 河南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119-120.
- [15] “当明德门内为会昌门, 又北章善门, 门内门下省、弘文馆在焉……当长乐门内为广运门, 又北明福门, 门内中书省、史馆、内医局、尚食厨、命妇院、修书院在焉”。徐松撰, 李健超增订. 唐两京城坊考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269.
- [16] 贾鸿源. 敦煌本《刺史书仪》“俵钱去处”所涉后唐官城诸门位置商榷 [J]. 华夏考古, 2021 (2).
- [17] [40] [47] 韦述. 集贤注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221.
- [18] 李林甫. 唐六典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221.
- [19] 洛阳官集贤院 (原丽正书院) 占太平公主内宅, 位于中书省以北, 《河南志》还载其位于命妇院、中书省以北。考虑到命妇院乃宫内礼仪实施的必要空间, 且大明官新设丽正书院也只是占据了部分命妇院旧屋, 仍保留了命妇院功能, 因此本文从《河南志》说, 认为集贤院以南为命妇院、再南为中书省。
- [20] 贾鸿源. 《唐两京城坊考》洛阳官城内诸曹署方位考误 [J]. 中国史研究, 2019 (4).
- [21] 傅熹年. 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二卷)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368; 王书林. 北宋西京城市考古研究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0: 112.
- [22] [34] [37]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隋唐洛阳城 1959-2001 年考古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4: 427-430.
- [23] [38]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隋唐洛阳城 1959-2001 年考古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4: 552-556.
- [24] 王书林. 北宋西京城市考古研究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0: 119.
- [25]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 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64.
- [26] [42]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隋唐洛阳城 1959-2001 年考古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4: 608-613.
- [27] 如天堂遗址发掘中发现的二号庭院遗址的三座建筑。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 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42-45.
- [28]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隋唐洛阳城 1959-2001 年考古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4: 451-458.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4: 651—653.

[30] 王书林, 徐新云. 洛阳宫唐武成宫院——宋文明官院格局探微 [J]. 南方文物, 2022 (4).

[33]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4: 411—412.

[35]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近年对九洲池东侧、天堂以西的区域也进行了发掘, 发现了唐明福门遗址及两侧的隔墙。明福门遗址位于今定鼎北路与唐官中路交叉口西北角; 唐洛阳玻璃厂氦氮站。2022年12月25日, 韩建华先生在“第二届中国古代都城及城市考古新发现交流研讨会”上简要介绍了明福门遗址的情况, 根据其所绘图纸, 明福门东邻GT56-77, 与本文推测位置一致。韩建华, 石自社. 隋唐洛阳城官城明福门遗址及宋代礮墩建筑基址 [C] //

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334、335.

[43] [45] 陈良伟. 隋唐东都官院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C] // 中国考古学会编. 扬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137—138、146.

[46] “尚食局, 奉御二人, 直长五人, 书令史二人, 书吏八人, 食医八人, 主食十六人, 主膳七百人, 掌固八人”。李林甫. 唐六典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320. 从编制人数看, 确实需要较大面积的院落空间。

[48] 文中的“行”都在院落四周, 如东行、南行, 那么, 其很可能指代靠墙的行廊。并且文中的“行”一般没有进深架的记录, 则进深可能仅一间两架。为计算方便, 本文以面阔一间=4米, 进深两架=4米估算。若遇殿、厅、堂等主体建筑, 则明间面阔按5米估算。

(责任编辑: 黄林纳)

《寻根》2023年第四期目录

百家纵横		读书读到曲彦斌	于淑敏
商代腰坑殉狗原因管见	陈 兹	胡适的婚礼“改良”	刘 磊
《千字文》文本溯源	王 剑	寻根发现	
东 西 风		崇仁相山板凳龙	蔡紫茜
“郑和下西洋”中的东洋和南洋	束有春	田野调查	
民间文化		黔东南月亮山区苗族架桥习俗	姜明芳
山西晋城的“开锁”仪式	成梦琪 钟静静	山东莱芜黑峪庙会调查	姬厚祥
浙中行灯号字与望族文化	杜晓波	序 与 跋	
民间习俗		印边拾零	
黔东南剑河苗族的腌鱼食俗	范端江	《鲁迅著作印谱》读记	林 夏
合浦县中秋节习俗	刘显钊	史家铃印可观史	
云南地区的年关“杀猪饭”习俗	周萍惠	——《太初先生印存》观读片语	闵惠泉
寻根扫描		姓氏文化	
中华本草异名端绪略考	曲彦斌	陈留郡与边姓	盖 巍
滑县明福寺塔及建造年代	宋 锐	阮国与阮氏	王学理
河南东周时期的诸侯国与青铜器	刘丁辉	家 族 史	
艺文杂谈		北宋虞城王氏家族姻亲概述	王玉顺 王 玲
传颂千年的唐诗五言绝句	周 实	博陵崔州平生平述略	胡以存
常熟士绅的纸上雅集: 吴《少渔像》	李文君	清代彭龄墓志铭考	张庆华 唐 新
四川方言“蛤蟆”浅考	康 健 刘 羽	文化遗产	
寻根情结		贵州安龙布依族染缬技艺	石兴博 褚兴彪